

清末民初中国人办的中等英语教育

——以四川地区为例

胡昊苏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清末民初,英语教育随着基督教的引进进入四川。除教会学校外,中国人开办的中等英语教育也开始占有一席之地。学制方面,清政府两次学制的颁布及文实分科的决定,使中等英语教育逐渐占据了科目中的重要地位。教员结构方面,外国教习与本国教习均有,但其水平参差不齐,大城市的教员水平普遍高于偏远地区。教材方面,英语各类书目较多,外国人和中国人编写的皆有,种类齐全,分类细化,基本可以满足英语教学的需要。教法上则注重循序渐进、由易到难。总之,这个时期四川地区中国人开办的中等英语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为英语在民国四川中等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学制、教员、教材、教法

中图分类号: G633.41; K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18)01-0123-06

English Secondary Education Launched by Chines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ake Sichuan Province for Example

HU Hao-su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English education was introduced into Sichuan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Christianity. Except for missionary schools, secondary English education set by Chinese started to take a place. In educational system, Qing Government enacted two official policies and separated science and arts which established English secondary education's great status in different subjects. Teachers were made up of both foreigners and Chinese, and their levels are not even. Teacher levels in large cities are generally higher than in remote areas. A variety of authors of refined English teaching materials were written by either foreigners or Chinese, basically meeting the demand for English teaching. Teaching methodologies wer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proceeding an orderly way, but due to various limitations, they did not take good effects. Above all, secondary English education launched by Chinese in Sichuan at that period made great progress. Those developments also laid soli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achievements of English secondary education in Sichuan.

Keywords: educational system; teacher; teaching material; teaching methodology

四川地区的英语教育,源于基督教在四川的引进。基督教各个差会纷纷在四川开办教会学校,这些学校在学制、师资、教学、教材等方面,都体现出了系统性和专业性,因而极大地促进了中等英语教育在四川的发展。此外,这些差会还把传教、办学与行医等有效地结合起来,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尽管在四川地区,英语被引入的时间晚于拉丁语、法语和日语,却因为基督教在四川的迅速发展逐渐超过了天主教,而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外国语。至此,英语在近代的四川中等教育中一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末四川兴起的洋务运动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在约开口岸重庆(1891年3月1日开关)创设洋务学堂。洋务学堂突破了传统书院的教学宗旨、学制、教本、教学内容及教法,增设外语、数学为主科,冲击了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在教育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为以后的西学兴起打开了一条通道。1896年,四川总督鹿传霖奉旨于成都创设中西学堂,讲授华文、西文、算学,即是成都地区最早的新式学堂。此外,还有洋务局所办内部学堂。当时记载有洋务局英文官学毕业生10名。“戊戌维新”期间,光绪皇帝于1898年7月下谕将各地的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

学、西学的学堂。诏书颁发后,各省纷纷行动。1898年,川东副使在重庆设立“中西学堂”,1901年,清廷下诏宣布新政,规定将全国所有书院(包括义学)改为学堂,分别建立大、中、小学堂和蒙养学堂。川省当局对朝廷“兴学育才”的诏令积极响应:1902年,四川总督岑春煊设立省学务处,督办全川学堂事宜,四川兴办新式学堂的热潮自此开始。在举办新式学堂的过程中,川省当局采取了造就师资、考察西学、延聘外籍教习、广筹学款、严定奖罚、明确规划等有力措施。尽管教学效果不尽人意,但毕竟迈出了兴学堂、倡西学、学西文的第一步。1902年5月四川总督府上折奏拟将尊经书院作为四川省城大学堂,而以中西学堂并入其内,庶中西两种学问均有涉猎。^{[1]80-81}此外,由于重庆新式学堂的创办较一般州县较快较易,20世纪初,这里的学堂占了多数。在这些新式学堂中,以英语为主的外语成了必修课,学制、教师、教材、教法标准则参照清政府的部颁规定执行。

一、学制

1902年,清廷颁布《钦定中学堂章程》,(亦称壬寅学制)。该章程共分四章,合计70节,规定“中学堂之功课,限修业四年”;课程共十二门,其中外国文(主要是英文)课时占总学时之四分之一。在《中学堂课程分年表》中对外语学制也有如下规定:第一年,学科阶段:外国文(读法,习字);第二年,学科阶段:外国文(读法,习字,讲解);第三年,学科阶段:外国文(讲解,文法,翻译);第四年,学科阶段:外国文(同上学年)。^{[2]499}可以看出,第一年、第二年主要涉及基础知识;第三年、第四年难度有所增加。具体学时方面,第一至第四学年,外国文均为九节,和《钦定中学堂章程》中的课时安排不谋而合。《章程》中还补充规定,外国文一门须用外国教习,或通晓外国文的中国教习,外国文以英文为主。在第一、二学年,外国文占了总课时37节的24.3%。第三、四学年,外国文在总课时中(38节)所占比例有所减少,变为23.7%。可见,英文在中学四年都是主课之一。尽管《钦定中学堂章程》在颁布不久即被废止,但它把外语等新科目正式列入法定的中等教育课程之中,不啻为一个重要的开端。

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中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其中中学堂章程共五章,合计35节。根据该学制之规定,中学堂学制为五年,课程仍为十二门,每周教学总时数亦为36小时,其中外国语为周8小时。癸卯学制对外语的教学目的、目标规定如

下:“外国语为中学堂必需而最重之功课,各国学堂皆同。习外国文之要义,在娴习普通之东语、英语及俄法德语,而英语、东语为尤要;使得临事应用,增进智能。其教法应由语学教员临事酌定,要当以精熟为主。”^{[2]509}换言之,中学堂开设外语,一为进入高等学堂深造打下基础;二为进入社会做准备,即可以和外国人自由交流“不假翻译”;三对兴办实业、出国考察、外事工作不无裨益。较之1902年的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对外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第一学年开始,“读法、释解、会话、文法、作文、习字”都要兼顾,而且持续五年,除第四年、第五年6个钟点外,前三年每星期均为8个钟点。和1902年相比,1903年癸卯学制规定前三年的外国语比壬寅学制每周减少一小时,第四、五年每周减少两小时(壬寅学制只有四学年无第五学年)。但需说明的是,清末曾实行12日为一周,一日6小时的授课制度,到癸卯学制颁布时才开始规定实行7日为一周的授课制,并一直延续。若照此看来,癸卯学制中的英文周课时实际并未减少。另外,关于外国语在总课时中所占的百分比情况,需参见《奏定中学堂章程》中的规定。^{[2]512}

事实上,这个学制的主要制定者张之洞本人就是洋务运动后期的重要领袖,他对外语学习是颇为重视的。作为清朝的一员开明之士,张之洞体会到了“洋文”在中等学堂中的重要性,主张办学人员出洋考察或购置教育学及教育管理书籍作为借鉴。在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新旧教育制度交替的时候,办新式学堂,开设英语科目确实不是一件易事。从全国范围看,当时即便是在创办初、中级学堂较多,开设外语科目较普遍的浙江、江苏(包括上海)、湖南、湖北、广东等省份,新式学校的数量与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相比还是少得可怜。像四川这样相对封闭的西部内陆省份,在中等学堂开办外语教育尤其是英语教育,还要达到清政府制定的标准,更是难上加难。川内一些有规模的学校英文教学质量尚且不敢保证,其他规模小些或偏远地区的中学就更不用说了。

1909年3月,清廷颁布《学部奏变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实科折》,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实科两类,分类教学。课程门类未变,只各有侧重。周学时文科、实科均为36课时,且都有外国语一科。折中对文、实两科外语教学语种具体规定如下:“外国语一科,或以英语或以德语为主;惟各省情形不同,间有宜习他国语言者,应由该省提学司体察酌定,报部核准。”^{[2]522}可见英语已稳坐中学堂外语教学

的头把交椅,详见表1-2。

表1 中学文科课程表(1909年3月)

科目	一学年	二学年	三学年	四学年	五学年
经学	10	10	10	10	10
国学	7	7	6	6	6
外国语	6	6	6	6	6
历史	3	3	3	3	3
地理	3	3	2	2	2
温习课目	7	7	9	9	9
合计	36	36	36	36	36

注:[1]文科通习课程包括修身、算术、博物、理化、法制理财、图画、体操等七门。[2]关于外国语一科之精神,学部令中已有规定“外国语一科,或以英语或以德语为主;惟各省情形不同,间有宜习他国语言者,应由该省提学司体察酌定,报部核准。”

表2 中学实科课程表(1909年3月)

科目	一学年	二学年	三学年	四学年	五学年
外国语	10	10	8	8	8
算学	6	6	6	6	6
博物	6	6	0	0	0
物理	0	0	8	0	0
化学	0	0	0	8	8
温习课	14	14	14	14	14
合计	36	36	36	36	36

注:[1]实科通习课程包括修身、国文、历史、地理、图画、手工、法制理财、体操等九门。[2]关于外国语一课之说明,与文科类的说明相同。

分析上述两类学科之课程表,可以看出外国语仍是中等学校最重视的学科。另外,在语种的选择上,德语有取代日语之势,但第一外国语仍为英语。中学实行文、实分科后,由于分科太严,致使师资缺乏、教学设备不全;能够进学堂的学生本来就有限,又要他们择科、转科,徒增一层困难。在当时的条件下,文实分科实为一个不合国情的失策之举。所以这个变通改革制度颁布未及一年,就有不少省份提出要求修改。修改方案于1911年初提出,其中主要的一条便是:实科的外国语由每周10学时减至8学时。从现存的资料看,这一时期四川的各地中学,多数并未贯彻文实分科的教学制度,而是以1903年的癸卯学制为依据来安排教学内容及每周课时的。但开办之初,因受到多种条件限制,在入学资格、修业年限等方面,则多有变通。

1910年,清廷学部在“实业教育宜择定外国语文并修改课程”的奏折中,对英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内中规定:(1)今后各类高等实业学堂乃至大学,英语为必修之外国语;(2)所用之各类实业教

科书可直接用英文课本;(3)学生毕业后送京复试也用英文考试,并要求外国文一律改为必修,以便“将来学生遵循升由初等、中等、高等以至大学,不致因文字歧出有所窒碍。”“以此明订办法庶学生于英国文学均知切实研究。”^{[11]109-110}此令颁布后,凡有志于升学之中学生便越发重视英语学习。

二、教员

(一)政策规定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来中国执教的英文教员主要是英美传教士或其他来华的洋人。至八九十年代,京师、上海、广州等地同文馆的许多毕业生陆续成为各类学校的教员,这算是我国在自己的学校内培养出来的第一批英文教师。1898年,四川、安徽两省,均有同文馆派遣的学生前往充当教习。除洋教习与同文馆毕业生担任教员外,还有其他人士。他们或曾就读于教会学校,或毕业于各类洋务学堂。为了规范各校教育水平,1903年的《奏定任用教员章程》规定,普通中学堂的正副教员,应由优级师范的毕业生及游学外洋有高等师范文凭者充任。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外国语教员。1903年《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对外国语教师有如下规定:“凡教外国语者,务须正发音、审读法,使学生以中国语释解回讲,又时使翻译书文。”^{[12]682}在初级师范学堂,外国语虽不是必修课,但外国语教员必须在发音、习字、文法、会话、翻译等方面达到规定要求。但因当时中学堂及培养中学师资的优级师范均系初创,还不可能按上述条件任用教员,于是《章程》中又作了权益的规定:“暂时只可择游学外洋毕业生,曾考究教学理化者充任,不必师范学堂毕业;或择学科程度相当之人员充任亦可”。^{[13]583}学堂虽不少,但教员缺乏,于是各省会开设了师范传习所。1906年6月,刚成立不久的学部即订定优级师范选科简章,内中明确规定:“分本科及预科,预科一年毕业,本科二年毕业”。优级师范学堂预科共开设十门课程,每周总学时为36学时,其中英文占8学时,为各门课程中占用学时最多的两门课程之一(另一门为数学)。^{[11]105}这充分体现了师范学堂对培养英语教员的重视。虽然当时四川对英语师资的培养亦较为重视,对教员也有一些明确的要求,但要等到国内师范生毕业后,再来新式学堂教英语无异于望梅止渴,一则数量不够,二则水平有限。

(二)英语教员概况

由于四川地处西南,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引进西方国家的办学形式和教学内容比沿海各省要晚

一些。1897年,戊戌维新期间,成都最早创办的新式学堂“中西学堂”的办学宗旨是:培植“讲求实学,博通时务”的人才。学堂每期招生定额为30人,15人学英文,15人学法文。学堂聘请华文教习若干名,英、法教习两名,教授习字、经史、策论、英语、法语、地理、算学、外国史策等课程。1902年,四川总督岑春煊改锦江书院(汉文翁石室旧址)为成都师范学堂;1904年改招中学班,校名改称成都府中学堂,这是清末成都兴办的第一所新式中学。四川各种学堂开办初期也面临师资短缺的问题,教员部分为短期出国培训或留学人员,部分为科举出身的举人、进士,也有少数外籍教师(主要是日本籍、欧美籍)。

当时,四川的办学对新学了解甚少,尚拘泥书院旧习,不能适应近代学堂的办学需要。于是川督锡良集资选士,自1903年开始选派数批学生赴日留学,参加师范速成科,以明教授之法。1903年至1905年间,每年都派出学生若干学习。1905年,四川高等学堂监督(校长)胡峻奉派赴日考察学务,数月后回国,将日本教育经验作为办理新学的参考,组织学科,订立规则,聘任中外教习(包括英语教习),为全省仿行表率。延聘外籍教习为当时节省费用而见效快之举,当局认为此举还可以免除留学生受西方“异说”影响之虞,故成都地区计有12所学堂先后聘请了82个外籍教习。^{[1]12}清末,在成都和重庆地区一些学堂的外籍教习中,有教自然科学的也有教外语的。在英文教习方面,由于可以完全用英文教授,外籍教习在英语教学中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四川外语教员严重缺乏,适当聘用本国外地教师也算是明智务实之举。例如重庆府中学堂就由中国籍和外籍教师共同教授英文。

关于四川学校、学生及教员的规模,有如下记载:“按照提学使署保存的记录,全省男生学校共计11,224所,学生338,078名;女生学校163所,学生5,660名;男女教员共计15,291名,外加校长和察学人员7,600名。”^{[4]237}归纳起来,当时四川的外(英)语教育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晚清四川新式学堂中,“华洋教员教授现代科学——化学、物理、外文等”;二是,新式学堂中外国语以英语为主;三是,不管教员是外籍的还是本国的,不论学校办学规模大小如何,在成都和重庆这样的省府或通商大埠,经费相对充裕,师资力量较强,新式学校的英文教学效果相对较好,但一些边远小县的新式学堂就差强人意了。如1902年吴玉章就读的泸州经纬学堂,是由周孝怀创办,“挂的是‘新学’的羊头,卖的是‘旧学’的

狗肉”。吴玉章回忆:“为了装点门面,也教点英文,但一个星期才教六个字母,简直把人气坏了。看到这种情景,我只住了十多天便愤而弃学回家,从此再也不想再在四川上什么‘新式学堂’了。”^{[15]2}

综上所述,清末废除科举后,全省即进行了学制改革,设立了一些新式学堂,并聘请中、外籍教员教授英文课程。这些学校,在大县份,教课组织及教员相对较好;但在僻远小县,由于经费和师资都欠缺,并不比旧式私塾强多少。尽管开设科目众多,中外籍教员都参与到教学中,但一些学校的教学水平仍不尽人意。

三、教材和教法

(一)教材及辞典

尽管中国的英语教育开始于19世纪初期,但所用教材多由外国传教士自行编写或直接借用国外的原版教材。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办后,立即着手编译各种教材。它首先翻印了19世纪后期英国人给印度小学生编的《Primer》一书,华文名为《华英初阶》,并广泛在初学英语者中使用。19世纪末,中国学习英语之风渐开,中等学校(包括许多教会学校)里所使用的英文课本即是从印度输入的《Primer》。此外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华英进阶》(由谢洪贲牧师编写),上市后轰动一时,在全国各地使用很广,影响甚大。

清末中等学校教材须经学务大臣审定。1903年《奏定中学堂章程》中规定:“凡各种课本,须用官设编译局编纂、经学务大臣奏定之本。其有自编课本者,须经学务大臣审定,始准通用。官设编译局未经出书之前,准由教员按照上列科目,择程度相当而语无流弊之书暂时应用,出书之后即行停止。”^{[13]18}英语教材原则上也需要用“奏定之本”。1906年9月学部颁布了《学部审定中学暂用书目表》,其中列入书目表的外语类教科书有以下两本(表3)^[11]。

表3 学部审定外国类教科书

书目	册数	用者	印刷	发行	版权	价值
帝国英语读本	五	学生	商务印书馆	同上	有	
应用东文法教科书	一	学生	湖北官书馆	同上	有	六角

1910年2月7日,学部关于“编辑国民读本分别试行”的奏折后附有《学务第一次审定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暂用书目凡例并表》,其中有外语教科书的一个说明是:“英文读本以伍光健所编为最佳,前已察定暂充高等小学之用,而其程度实与中学为宜,仍未作中学教科书。”^[11]这里提及的英文读本,指的即是上表中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出版的由伍

光健编写的《帝国英文读本》。该书从第一册的英语字母发音和书写开始,逐渐加深,直到第五册的英国文学作品选读。除上述教材外,还有以下审定书目,如表4~5所示。

表4 清政府学部审定的中学外语教科书(暂用书目)

书名	册数	用者	印刷	发行	版权	价目
英文普通史纲目	1					
初等英文典	3		商务印书馆	同上	有	1.50元
中等英文典						
高等英文典						
新法英文教程	1		商务印书馆	同上	有	0.80元
英语作文教科书	1	学生	商务印书馆	同上	有	1.00元
简要英文法教科书	1		商务印书馆	同上	有	0.80元
英文汉诂	1	学生	商务印书馆	同上	有	1.20元
英语捷径前后编	2		商务印书馆	同上	有	0.80元
应用东文法教科书	1		湖北官书局	同上	有	0.60元

表5 1902—1912年各地采用的初、中级英文课本

年份	书名	册数	作者	出版者
1902	英文初范	1		商务印书馆
1906	华英初学	2	约翰书院施女士	上海一新书局
1907	英文典教科书		(译自日文)	河北译书局
1909	英文典(初、中、高)	3		商务印书馆
1909	英文教程			商务印书馆
1910	英文益智读本			商务印书馆
1910	初学英文轨范			商务印书馆
1910	简要英文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

清末学制,外语以英语为主。清末四川中等学堂使用的英文教材以日本人编写的《正则英语》系列教材为主,作为初级入门教材,《正则英语》编排合理、讲解周详,受到了师生的欢迎。此外,还有国民英文教科书系列。但进入到较高级的英语学习阶段,使用的教材就有所不同了。如成都省城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英语读本采用的是《羌伯士读本》(Chambers Readers),文法则是《纳氏文法》(Nesfield English Grammar Series)第三、四两册。

英语字典方面,1901年,严复为《华英音韵字典集成》作序,1902年出版。该字典“音韵以英儒韬纳耳本为宗,译义以英国罗布存德本为主,并加增订”。全书共收“字语十余万言”,“附图千有余幅”,后附“英国假借他国俗语解义,减笔字解记号汇释及中西地名表”。这是当时较大、较全的一部英汉字典,严复赞誉此部字典“独出冠时,世所宝贵”。^{[6]524}1903年商务印书馆准备出版上海南洋公学教师胡文甫、吴慎之编译的《袖珍华英字典》,全书约收四万余字。并邀请严复为其作序。1908年商务出版颜惠庆等

编著《英华大辞典》(上下册),严复再作序:“乃近者,以吾国西学之日进,旧有不足以饜学者之术,以与时皆进也……”^{[6]524-525}可见,随着西学的进步和发展,英文字辞典也需要不断更新、充实,以便能与时俱进。在这些工具书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袖珍华英字典》和《英华大辞典》进行了数十年。

概括说来,英语各类书目众多,种类齐全,分类细化,包括拼字、文法、会话、读本、工具书(字典)、作文及翻译等,基本可以满足英语教学的各种需要。

(二)教法及效果

教法方面,先学音标、发音、字母,然后是单词、字义、短句练习,接着学文法(语法)、翻译练习,到高年级时学得好的一般可以借助字典进行阅读,并进行初步写作、作文训练。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为例,该校的英语教学水平在当时的四川已属最高层次,不仅有洋教习,中国教员中杨庶堪、卢鉴池也都是教法上具有独到之处的英语教学名师,但是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而言,受到教员、教材、教法等等因素的制约,即使具备相当的国文基础,学习英语也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情。学习初期,掌握英语字母起码也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尽管英语的教法遵循了循序渐进的原则,但对文化体系、音韵结构、发声方式完全不同的中国人而言,初学之时,英文确像天书一般难读难懂,英语学习对一般人而言确实困难。加上清末四川的绝大部分地方还很闭塞,欧洲文明的影响微乎其微,英语学习的语言环境比沿海省份又要差一些。因此,需要学生非常用功才能有所收获。

英语被引入四川的时间虽然较晚,却因为基督教在四川的迅速发展逐渐超过了天主教,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外国语。学制方面,清政府两次学制的颁布及文实分科的决定,使中等英语教育逐渐占据了科目中的重要地位。教员结构方面,外国教习与本国教习均参与到教学中,但其水平参差不齐,大城市的教员水平普遍高于偏远地区。教材方面,英语各类书目较多,外国人和中国人编写的皆有,种类齐全,分类细化,基本可以满足英语教学的需要。教法上则注重循序渐进、由易到难,但由于受诸多条件的制约,效果还是不甚理想。

综上所述,四川中等英语教育与全国学制同步。四川中等英语教学聘请的教员既有本地培养的,也有基督学校或留学归来的毕业生,他们都是具备了英语教学水平的。教员来源多以本地为主,也有一部分外地或外国人士。四川地区选择的

等英语教材也是符合政府规定的,选取的教材大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和全国中等教材基本同步。此外,中等英语教学主要以服务社会、学生升学、就业或留学为目的,部分毕业生进入海关、邮政或银行等和英语需求有关的部门工作,可见当时的中等英语教育还是颇具实用性的。

总的说来,清末民初中国人办的中等英语教育,尽管有不足之处,但由于社会的需要和政府的重视,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些都为今后英语在四川中等外语教育界的主导地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李良佑,张日昇,刘犁. 中国英语教育史[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
- [2]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
- [3] 成都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成都市志:教育志[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 [4] 中国海关1902—1911年报告:第3辑第1册[M]//四川文史资料选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64(11).
- [5] 吴玉章. 辛亥革命[M]. 成都:人民出版社,1974.
- [6] 蔡元培.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